

学术动态综述

《生产力研究》No.9.2009

社会性规制述评

郑 慧^{1 2}

(1.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 310005 2.湖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摘 要】 社会性规制不是以特定产业为研究对象,而是政府对公众不断增长的对生活质量(健康、安全 and 环境保护)的追求而实行的跨产业、全方位、综合性的规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社会福利等问题的关注日益加强,特别是在各国政府在对相关产业实施经济性规制放松或规制缓和政策的同时,将规制的重点逐步转向社会性规制领域。社会性规制在政府规制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内容不断扩展,方法不断改进。在社会性规制研究方兴未艾之时,对社会性规制研究的演进、理论主题、内容、方法的总结和评述,对社会性规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 社会性规制;内涵;展望

【中图分类号】F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768(2009)09-0165-05

政府规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进行的规范与制约。政府规制的产生是市场经济演进的结果。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有意识的干预始于19世纪中后期,19世纪末对垄断行业的规制开始显示出政府规制的效力。其后,规制经济学兴起,经济学家们对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规制活动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经济规制理论和方法不断完善。

另一方面,与经济性规制相比,社会性规制的研究起步较晚。虽然在美国,有据可查的对工厂安全的规制可以溯及1867年,^①对食品、药品等方面的规制也很早就有了实践,但由于经济发展在社会进程中的主导地位,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更为敏感,对经济的干预一直都存在。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重视社会性规制,理论界才开始较为系统地研究社会性规制问题。社会性规制不是以特定产业为研究对象,而是政府对公众不断增长的对生活质量(健康、安全 and 环境保护)的追求而实行的跨产业、全方位、综合性的规制。

正是因为经济规制在政府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经济学家们对经济规制的研究更为重视。对经济规制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与争论主导了规制经济学界。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社会福利等问题的关注日益加强,特别是各国政府在对相关产业实施经济性规制放松或规制缓和政策的同时,将规制的重点逐步转向社会性规制领域。社会性规制在政府规制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内容不断扩展,方法不断改进。在社会性规制研究方兴未艾之时,对社会性规制研究的演进、理论主题、内容、方法的总结和评述,对社会性规制发展的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社会性规制的演进与内涵

(一)社会性规制的兴起

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经济规制的逐步放松,社会性规

制缓慢兴起。在20世纪初,政府社会性规制领域只是局限于食品和医药领域。而到了60年代中期,政府干预的范围扩大,社会性规制的范围随之逐渐扩大,并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最初的食物、医药到安全、健康,再到21世纪人类最为关注的环境保护。“几乎所有主要的风险与环境规制机构都出现了,诸如美国环境保护署、美国联邦公路交通安全署、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职业安全与卫生规制机构以及核能规制委员会等组织机构都是在70年代开始运作的”。^②

社会性规制蓬勃发展的动因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市场失灵的存在。与经济规制相同,市场失灵也是社会规制产生的背景。外部性问题越来越严重,信息不完全所造成的伤害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企业微观经济主体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大量空气污染、水污染、有毒废物等,影响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和身体健康。而作为一种经济品,信息的独特性质决定了私人企业缺乏在各种危害的潜在影响方面开展研究的动力。社会性规制的各个领域没有一个可以完全由自由市场解决。二是规制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为建立社会性规制提供了理论基础。A·C·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一书在分析外部性影响时认为,当存在外部性情况下,不好的副产品生产过度,而有利的副产品又生产不足时,把政府干预作为改进福利的办法是有道理的。社会性规制这种新的规制形式将增加非市场物品的生产,如清洁的空气、安全的产品等,减少如污染的空气之类的市场溢出。三是社会影响的增加。社会愈加富裕,人们对个人健康状况及提高物质福利水平愈加关注。对生活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对生命越来越珍惜。像卫生设施标准以及对食物配制品洁净的要求等,早在20世纪初就比几百年前提高了许多。四是对政府治理责任的要求。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政府(而非市场)才是确保人类生存能力的合适的工具。政府有且应当有责任保护环境的质量和个人的日

【收稿日期】2008-04-17

①丹尼尔·F·史普博:《管制与市场》,余晖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6页。

②W·吉帕·维斯库斯、约翰·M·弗农、小约瑟夫·E·哈林顿:《反垄断与管制经济学》(第三版),陈甬军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372页。

【作者简介】郑慧(1971-),女,湖南辰溪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地方政府改革与治理。

常生活中的健康与安全这一要求越来越强烈。

(二)社会性规制的内涵

对社会性规制的定义大同小异,基本上是以日本学者植草益的定义引申出来的。“社会规制是指以保障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安全、健康、卫生、环境保护、防止自然灾害为目的,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各种活动制定一定标准,并禁止、限制特定行为的规制”。^①社会性规制是以确保国民生命安全、防止灾害、防止公害和保护环境为目的的规制,是与对付经济活动中发生的外部不经济,提供公共性和准公共性物品有关的政策。

从社会性规制的兴起可以看出,社会性规制本质上是以增进社会福利为目的。政府进行社会规制的最终目标是要在保证人类“可生存性”基础上去追求资源配置高效率和社会公平。“社会性规制以对付外部性、公共性物品、非价值性物品、信息偏在等市场失灵为目的的,也就是说,社会性规制是以纠正市场失灵下发生的资源配置的非效率性和分配的不公正性为目的的,然而,这只是经济学的观点,社会性规制的目的还有维持包括治安等在内的社会秩序及经济社会的稳定,因此不能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谈论社会性规制的目的”。^②社会性规制自然有其经济目的,是对“市场失灵”所导致的市场效率的损失的规制,更为重要的是其社会目的:市场主体对人类“整体利益”的侵害的规制。

但是,与经济规制一样,规制的目的并不总是使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是在社会特定群体间进行福利转移,而且,这些转移可能会以缺乏效率方式来进行。因此,社会规制政策可能远远不符合我们的理想。

(三)社会性规制的特征

社会性规制涉及的领域很多,而且各个领域都有其特殊性。但是透过这些特殊规制对象的各个不同的表面特征,仍然可以看到社会性规制本身所具有的一般性特征。一是规制是强制执行的,是政府职能的一种体现。社会规制是用政府强制力去限制或影响经济主体决策的过程,因而规制必然具有政府决策的优势和弊端。这决定了规制也是不完全的,就像市场的不完全一样。二是公益性。社会性规制的产品是公益产品,具有不排它性,规制的成果任何人都可以享用。三是横向制约性,与经济规制是政府对某特定产业的纵向制约不同,社会性规制并不针对某一特定的产业行为,而是针对所有可能产生外部不经济或内部不经济的企业行为。任何产业内任一企业的行为如果不利于个人的健康、安全,不利于提高环境质量,都要受到相应的政府规制。四是责任性。社会性规制是政府对社会治理责任的一种回应,是政府社会治理职能的内在组成部分。

(四)社会性规制的内容及方法

社会性规制涉及的是对人类可生存状况的规制,其内容主要有(1)环境规制。人类社会总是在一定的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质量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类的生活质量。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噪声污染是最基本的环境污染类型。环境规制是社会规制的基本内容,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一种规制。(2)安全规制。安全规制涉及人类的生命保护和财产保护,主要包括交通安全、产品安全、工作场所安全。(3)健康规制。主要包括食品、医药、卫生、产业灾害的规制。(4)专利和文化保护。包括专利权、教育、文物保护等。

针对社会性规制的内容,社会规制发展出的方法既有与经

济性规制相一致的禁止特定行为、营业活动限制、资格制度、审查检验制度、标准规制制度等传统规制方法,还有与特定内容相关的创新方法(1)影响评价制度(2)许可证制度(3)产权交易制度(4)信息提供制度(5)收费补偿制度等。

二、社会性规制的理论假设及主题

由于社会性规制的兴起是在政府逐渐放松经济规制之时,此时对于经济规制而言,已经经历了一轮规制的浪潮,种种规制理论和方法均已发展得较为完善,之所以放松规制,是因为在规制的过程中严厉的政府规制不断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进行阻碍,经济学家们发现,过度的规制并没有给社会带来预期的好处,甚至带来了负效益。而社会经济的发达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把关注的焦点投向了对生活质量的追求,社会性规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一要求。同时,经济规制的理论和方法给这种新的规制浪潮以极大的支持。可以说,社会性规制的理论和方法是在借鉴经济规制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相对于经济规制而言,其理论构建还处于成长时期。

(一)社会性规制的理论假设

外部性假设和信息不对称假设既是经济规制的主导假设,也是社会规制的主导假设。

1.外部性假设。外部性是指一定的经济行为对外部的影响,造成私人(企业或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偏离的现象。外部性可分为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这种经济行为给外部造成积极影响,使他人减少成本,增加收益。负外部性是指这种经济行为给外部造成消极影响,造成他人成本增加,收益减少。外部性问题是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首先提出的(当时被称为“外部经济”),后来,庇古在其《福利经济学》中对此加以充实和完善,最终形成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假设是社会规制的主体假设。社会规制之所以兴起,是人们发现“市场机制不能对各种公共资源发挥优化配置的作用,造成市场失灵,因此,为消除各种负外部性,就需要借助政府力量,对各种公共资源实行有效的政府规制。同样,对于植树造林、清洁河道、建设公园、草地等不能或难以补偿行为者成本的正外部性,也需要实行政府管制,通过建立某种补偿机制,以刺激私人的正外部性行为,或在许多场合下,直接由政府从事正外部性活动”。^③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市场不能正确估价和分配环境资源,不能将环境成本化于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中,从而导致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不能反映它们的环境成本。大规模的环境恶化是负外部性的明显表现。

解决外部性问题是使外部性内在化,把行为主体的活动与其结果紧密联系起来:当行为主体的活动产生负外部性时,通过社会性规制,将负外部性成本由行为主体承担,以促使行为主体采取措施减少负外部性;当行为主体的活动产生正外部性时,通过相应的社会性规制,正外部性收益由行为主体享受,激励行为主体保持提供正外部性的努力。

2.信息偏在假设。信息偏在是指有关交易的信息在交易者之间的分布是不对称的,即一方比另一方占有较多的相关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另一方则处于信息劣势地位。这种信息不对称现象是普遍存在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威廉姆·维克斯(William Vickery)和英国剑桥宾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 Mirlees)这两位经济学家分别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揭示了信息不对称交易所带来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他们获得了199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①②植草益:《微观规制经济学》,朱绍文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22、287页。

③王俊豪:《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34页。

存在信息偏在问题的基本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社会分工和劳动分工造成不同市场交易者所拥有的知识的不对称性；(2)信息的搜寻成本；(3)拥有信息优势的交易者对信息的垄断；(4)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5)有关商品质量和安全的信息可能难以获得。^①

信息偏在会引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逆向选择会造成“劣质产品驱逐优质产品”。交易中的一方希望得到高质量的产品，而另一方却只愿意提供低质量产品。道德风险的是指交易双方达成一项合同或契约后，交易一方在单纯追求自身利益时做出对另一方不利的行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都会严重影响公平交易，造成市场低效率。要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现象，就要从根本上缓解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缓解信息偏在的途径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利用市场机制本身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当存在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时，有时市场会做出反映，提供更多更好的信息。例如厂商的免费保修、名牌战略等行为。二是通过政府规制缓解信息偏在。当缺乏市场解决方案时，政府规制的行为就有了理由，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行规制，如直接提供信息、要求厂商或其他机构披露信息、禁止有危险的产品的销售、鉴定产品、强制实行产品最低标准等。

(二)社会性规制的理论主题

生命价值和道德、风险规制和成本效益分析是贯穿于社会性规制活动中的理论主题。

1.生命价值和道德。政府规制是否必要，经济学家们均是从成本——收益分析来进行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性规制中，政府规制收益与经济规制是不同的，它不仅涉及投入与产出，更关注人类的生命、健康、安全和生活质量。人们有权利要求政府对非市场物品生产进行保护，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社会规制中有很多情况是缺乏可被用于估计隐性价格的市场有效数据的。比如，预防基因破坏或者拯救一个濒于灭绝的物种到底应该价值多少？谁能计量出人的生命价值？人们无法给清洁空气或它可能拯救的生命标价。

生命价值和道德理论是政府强制实行社会性规制的最主要的理由，是社会规制的内生变量。保护公民健康和安全的主题一直是政府治理的题中之义。对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的保护是人类对污染可能产生的各种问题的担忧，尤其是对代际问题的一种回应。同时，“采取管制的行动还有道德上的理由”。^②在人类的生命安全、健康保护、环境保护与为实现这种保护所花费的货币价格之间的取舍是一种价值判断。对环境的保护不仅有关人类的健康，还事关美学的问题，为了人类的欣赏，需要保护自然美。^③

社会性规制的结果是一种无形效应，这种无形效应影响人们的满足程度，却没有市场价格能衡量它的价值。例如，职业安全与健康规制使工厂工人面临的健康威胁降低、舒适度增加；噪音规制给居民带来的舒适度的增加等。这些都难以用货币量来衡量。这些无形效应不能被简单地忽略，而应该以定性的方式考虑。因而，社会规制的生命价值和道德理论体现的是幸福价值标准，是人类对幸福和美好生活的追求。

2.风险规制。人类在社会生活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风险是对公众健康和安全的威胁。社会性规制的目的之一就是风险的预防。如香烟盒上的警告标志、对新药品的检验、安全

带的强制推行、工作场所安全隐患的消除等。个人对自己的安全保护由于得到的信息不完全，对某种知识的缺乏以及无力承担对某些风险的预防，因此，“存在着充分的经济上的理由，支持政府以某种方式对带有风险的交易进行干预，尽管这些交易看上去完全属于私人的性质”。^④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可以比个人要较为容易地获取科学的信息，并将信息有效地传递给公众，制定所需要的规制，从而控制真正存在的风险。

但是，人们对风险的感受存在着非理性和偏见，比如，个人倾向于过高估计一些出现概率较低的风险，如食物中毒、龙卷风、洪水等。相反，他们对一些出现概率较高的风险，如癌症、心脏病与中风等却往往估计较低。保守偏见的最后结果就是进行与实际遭受风险几乎没有关系的风险估计，使政策的制定者难以确定哪些会引起风险，哪些不会。风险理论提示出，政策制定者应该意识到真正的风险是由各种不同的情况引起的，因此，要在不同的规制选择中进行比较判断。否则的话，就会冒扭曲政策的危险，并将注意力集中于那些不被理解，而又几乎没有预期回报的危险。

社会是存在风险的，并且这些风险并不会因为规制的行为而消失，“即使一项完全有效的规制努力也不能够指望其消除意外事故的发生，其努力也只能在减少全面死亡率方面发挥极小的作用。因为个体行为常常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对工作中意外事故责任分担的研究表明：这类事故中的绝大多数，至少相当一部分，是由工人的个人行为造成的”。^⑤即使完全成功的规制程序也不能彻底消除死亡的风险。无风险的社会是不存在的，风险理论表明，社会对风险的预防是有限的。

3.成本—效益分析。与经济规制相比，社会规制的行政成本要高很多，一方面社会规制的内容更为繁杂，所涉及的面更广泛，因而所制定的政策标准更多、监控的难度更大；另一方面，因为安全与健康是无价的，美国最高法院对职业安全与健康法的解释说，规制机构不能把它的规制放在正式的成本—收益检验的基础上，清洁空气法甚至更加明确地禁止在建立空气质量标准中考虑任何种类的成本。这种把注意力集中在最坏事态的实例上，而不考虑风险发生的概率导致社会规制缺乏成本分析，规制的成本越来越高。从社会性规制的政治性来说，政治家出于政治目的的需要，往往不愿意让公众了解规制的花费，规制成本的不透明也导致社会性规制的行政成本比经济规制高出许多。

与经济规制关注公平与效率不同，社会规制把关注的焦点投向了责任和道德。经济规制的成本和收益均可以用价值单位来衡量，而社会性规制是对公共利益的规制，规制的结果是公共产品的产出，公共产品及其社会后果很难用经济的指标准确计算。因此，在社会性规制中只有成本以价值单位来计量，政策的收益很难用价值单位来衡量，收益（更确切地说，规制政策的效果）是以物理单位（例如挽救的生命数）而不是价值单位来表示的。对社会性规制的成本—收益分析是难以进行的，采用的是成本效益分析。

在成本效益分析中，成本效益分析将各政策方案按照单位的成本（例如每挽救一个生命的成本）或单位成本的效果（例如每万元挽救的生命数）排出优先顺序，然后从中选择单位效果成本最低或单位成本效果最大的方案作为最终方案。

成本效益分析避开了用货币形式来计量收益问题，为规制

①马昕、李泓泽等：《管制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②③④小贾尔斯·伯吉斯：《管制与反垄断经济学》，冯金华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343、370页。

⑤W·吉帕·维斯库斯、约翰·M·弗农、小约瑟夫·E·哈林顿：《反垄断与管制经济学》（第三版）陈雨军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373页。

者提供了一个比较不同政策方案单位收益相对效力的指标,因而比成本—收益分析更容易应用。但是成本效益的衡量仅局限于特定的目标群体,无法将政策的结果与全面经济效率或社会总体福利相联系,无法判断一项政策是否带来社会净收益,因而对是否应当实施某项政策无法给出绝对判定准则,也就是说不能解决政府是否应当规制的问题。

三、社会性规制的反思与展望

(一)社会性规制的反思

1.对社会性规制的认识。社会性规制作为政府规制的一个方面,必然存在着政府规制的缺陷与弊端:规制的公共利益与部门利益的冲突,规制俘虏现象的表现,规制的需求与供给的矛盾,规制的成本—收益衡量的困难,规制的失灵等等。更因为社会规制的对象较经济规制抽象,涉及生命价值、道德伦理、风险水准、政治影响等不确定因素更多,因此,社会规制所面临的问题更为突出。无论社会规制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好处(这些好处也许很大),但同时也都会付出代价。对成本控制的忽视易于产生浪费和缺乏效率,政府缺乏判断其干预行为的适当标准,政府干预存在任意性,政府规制的公正性和有效性难以体现等等。政府规制不仅是政府对公众权益的保护与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视,更是政府对实现其社会责任的一种回应。但是它有选择地把更大的限制和更大的成本强加在那些过去享有更多自由和更多净收入的人身上,以达到改善其他人的福利的特殊目的。政府规制并不必然带来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社会福利的增加,规制也会产生低效率和福利的损失。

2.命令、控制制度的缺陷。社会性规制通常采用命令、控制制度来达到规制的目的,然而,命令和控制制度存在着很大的缺陷。第一,命令、控制制度缺乏灵活性,没有对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它采用的是统一标准,在每一项规制中,法律都要求统一,而没有考虑成本(或收益)。同时,技术标准的制定花费的时间长,公共投资多,标准具有滞后性。第二,命令、控制制度倾向控制技术选择,而不是业绩,阻止了对更好的控制方法的探索。被规制者缺乏采用更新、更好、更有效率的技术的激励。第三,命令、控制制度有利于现有企业的利益,对新企业的进入障碍阻碍了竞争。例如,在污染未达标区域,现有污染源必须进行“合理”的努力,以改善它们在排放方面的表现,而新的或更新污染源则必须满足最低可实现排放速度的条件才有资格得到许可证。“区别对待规则的效果是:(1)保护‘更加肮脏’的活动;(2)挫伤投资‘更加清洁’的设备的积极性,至少在近期是如此。”^①第四,规制更多地体现了政治性。有的时候,规制是有意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而不是市场或某个市场替代物来发挥作用的,是为了满足特殊利益集团的需要。

3.代际问题。代际问题突出表现在环境规制上。人类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越来越严重。资源枯竭、水土流失、环境污染及衍生的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酸雨、沙尘暴等环境问题,不仅对人类生存构成了威胁,更对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危害。环境的污染由谁来治理,是我们还是我们的孩子?污染的结果由谁来承受,是我们还是我们的孩子?对全人类生存环境的维护是当代人的对后代是否能良好存续的担忧的一种积极回应。

环境质量作为一种代际公共品,存在一个成本和收益的跨期分配问题。而实际上,政府的规制决策通常倾向于短期的成本—收益计算,而忽视了规制的长期影响。现在面临的是对污染的减少甚至消除,对环境质量的优化不仅仅是控制,而政府

出于对经济发展及政治支持的考虑,对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还不能满足人类最优生存的需要。对代际问题的忽视是社会性规制的最大不足。

(二)社会性规制的展望

社会性规制的发展还只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都还不完善,存在缺陷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和规制经济学家们对社会性规制的研究和探索犹在进行。对经济规制的放松和对社会规制的加强显示了这样一种趋势:社会性规制代表了一种革命,它抛弃了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是对市场制度的种种缺陷的修正,减少市场经济运作可能对社会带来的损失,限制负外部性的溢出,激励正外部性活动,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保障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社会性规制的发展体现了这样几种趋势:

1.合作遵循。社会性规制政策会导致企业成本增加,使企业产生逃避规制的动机。因此,社会性规制多是以一种对企业的威慑力量来强制执行规制政策,不仅政府的立法成本和执法成本不断爬高,居高不下的企业遵循成本也迫使企业一方面遵照规制标准改进,另一方面伺机钻政策的空子,规制者和被规制者始终处于一种零和博弈的状态,规制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近些年来,在强制执行机制的设计方面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基于合作的遵循机制,它对传统的基于威慑的强制执行理论的基本假设提出了挑战。

自愿遵循的基本假设是:除了直接的经济因素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影响企业的遵循决策,比如来自竞争者的压力、出自建立或维护企业声誉和形象的目的,甚至是为了避免和规制机构打交道。基于这一认识,合作式遵循机制强调社会性规制机构与被规制企业建立一种信任与合作的关系,鼓励企业的自愿遵循行为,在协商而不是威慑的基础上实现规制的目标。例如美国环境保护署推出的“自我审计”政策——鼓励企业自我公开、自我改正违规行为,鼓励措施包括对自我公开的违规行为为不提起刑事诉讼、罚款额减免75%等。^②

合作式遵循机制的优点是节省了大量的强制执行成本,通过种种激励措施使企业的自愿遵循行为最大化,规制机构可以集中其有限的资源监察恶性违规者,从而提高规制政策的实施效率。

2.信息规制。作为对命令、控制规制的一种替代方法,信息规制越来越受到重视。信息规制的优点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政府不能完全地禁止某种活动,规制机构没有充分的信息来执行某个禁令的情况下,信息的提供可以起到告诫消费者这中间有潜在危险的作用。这样消费者至少采取谨慎的态度来处理,直到有更充分的信息才采取进一步行为。第二,个人有选择风险的自由,如果由于个人的品味而愿意承担风险,那么通过信息规制也是最恰当的反应。提供给消费者的信息将使消费者有能力做出市场决定以及选择合乎他们自己偏好的最有效的风险水平。第三,经济学家认为,信息规制的魅力在于这样的规制在同样的技术标准下不会干扰市场运行。它们不是强制厂商增加成本,而是更恰当地通过向消费者提供信息的方式进行规制。这样,市场能够以更加有效率的运作来产生追求安全水平的动力。第四,在产品安全规制中,存在着消费者对安全设施规制的认识误区。因为安全设备产生了一种骗人的效果,使不少消费者误解了安全设备的功效,并由此导致了危险不应该有的马虎。因此,安全警告和风险信息等风险转移政策应

①小贾尔斯·伯吉斯《管制与反垄断经济学》,冯金华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6页。

②马昕、李泓泽等《管制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13页。

该成为社会性规制的主要策略。

【参考文献】

[1] 植草益.微观规制经济学[M].朱绍文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2] 丹尼尔·F·史普博.管制与市场[M].余晖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 W·吉帕·维斯库斯 约翰·M·弗农 小约瑟夫·E·哈林顿.反垄断与管制经济学(第三版)[M].陈甬军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4] 小贾尔斯·伯吉斯.管制与反垄断经济学[M].冯金华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5] 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M].郑秉文译.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6] 让-雅克·拉丰,让·梯若尔.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M].石磊,王永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7] 王俊豪.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8] 马昕,李泓泽.管制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9] 曲振涛,杨恺钧.规制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10] 谢地.政府规制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11] 余晖.谁来管制管制者[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Z 校对 L)

(上接第 90 页)

(三)物流区位环

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大城市在第二、第三产业高度发展后,聚集效应会使市中心聚集压力过大,而抵消因聚集产生的正向极化效应,影响城市产业的发展。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减少这种过分向市中心聚集的压力(聚集力),期望能够将作用于城市的这种由市中心向郊区呈“峰形”特征展开的聚集力转变为“峦形”分布,如图 3 所示。转变方法是在城市周围实现环线交通,将城市的物流区位线外端依次用环线连接起来,并在交通环线周边产生城市的大型物流节点,以承担城市与其他地区物流联系的功能及过境物流的功能,从而形成城市物流区位环。城市物流区位环多发生在市区不同人口密度(人口密度函数以 $f(s)$ 表示)分布的接口处或相交处,一个城市可以形成多层物流区位环,见图 4。内环的物流活动主要为城市生产和生活提供服务,外环的物流活动主要为区域经济联系提供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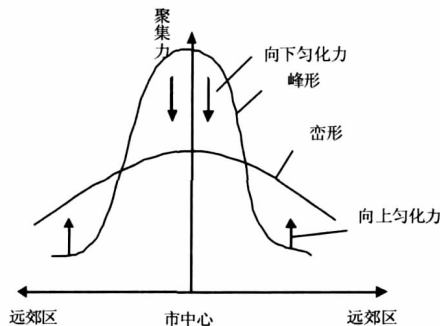


图 3 城市产业集聚力分布曲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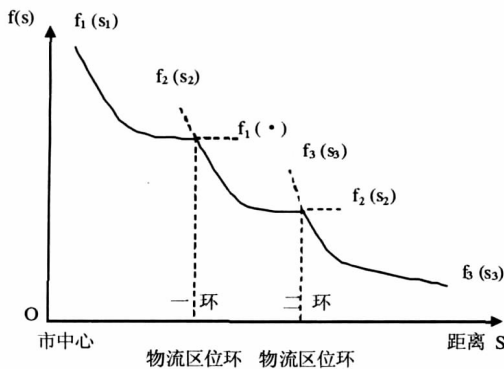


图 4 城市物流区位环分布示意图

四、物流区位研究的作用和意义

物流区位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物流区位的优劣之分在于物

流区位本体特征所决定的区位因子对人们物流活动的影响程度,正面影响会提升物流区位的优势,负面影响会带来物流区位的劣势。在现代物流活动过程中正确分析和运用物流区位,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在区域物流系统中,节点城市是区域物流需求的集聚点和重要的物流区位点。通过对节点城市物流区位的科学分析,可以掌握区域范围内物流活动的分布规律和发展趋势,特别是在城市区域化和区域城市化过程中区域空间结构重新调整组合的大背景下,城市群经济逐渐成为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凝聚点,是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最佳场所。城市群区域物流区位的研究可以揭示物流网络系统的层次、结构及发展趋势,为城市群物流系统规划、物流资源合理配置以及物流区位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2.由于各城市的规模、性质和地位作用不同,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各产业与物流发展水平的关联度具有较大差异。通过区域城市物流区位分析,可以掌握各节点城市与物流发展的关联度,为物流区位选择、产业区位决策以及制定促进物流发展政策提供理论指导。

3.城市是区域物流网络中的节点,不同城市物流区位线和物流区位环有机结合形成区域高效的物流网络系统,促进区域经济要素的集聚与扩散。研究区域城市的物流区位,可以指导不同类型、不同级别、不同性质的城市物流区位点之间有机结合,构建顺畅高效的物流通道和物流网络。

【参考文献】

[1] 张文忠.经济区位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2] 管楚度.交通区位论[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3] 陆大道.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M].北京:经济出版社,1999.
[4] 刘再兴,蒋清海,侯景新.区域经济与理论[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6.
[5] 赵启兰,王稼琼,刘宏志.物流规划中的需求与潜在需求分析[M].中国软科学,2004(2).
[6] 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7] 官卫华,姚士谋.城市群空间发展演化态势研究[J].现代城市研究,2003(2).
[8] 刘建伟,禹海霞.基于发展循环经济的现代物流业的构建[J].生产力研究,2007(13).
[9] Fujita M.P., Krugman A.J., Venables.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9: 312-350.
[10] Garrison C.B., Paulson A.S. An entropy measure of the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J]. Economic Geography, 1973, 49(4): 319-24.

(责任编辑 X 校对 Z)